

悲剧 崇高 史诗

——小议战争文学的审美品格

□李茂增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品格。作为一种以表现和反思战争为主题的特殊文学类型，战争文学的审美品格主要表现为悲剧、荒诞、崇高和史诗。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比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更为沉重。与此相应，悲剧构成了战争文学最基本的审美品格，是战争文学作品最天然的底色和基调，很难想象一部无视战争创伤的作品能够成为伟大作品。战争文学的悲剧性首先表现为战争对幸福生活的破坏和对美好生命的毁灭，即鲁迅之所谓“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诗经》中征夫思妇的离愁别苦，唐代边塞诗中的沙场白骨，前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5位年轻女兵的牺牲，电影中纳粹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不揭示了战争的冷酷和对文明的摧残。其次，战争文学的悲剧性表现为人类价值在战争情境中的冲突以及主人公因冲突而遭受的苦难。在战争的极端情境中，两种各自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片面的一面的理想或价值势均力敌，形成冲突，使得主人公面临两难困境，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会陷入灾难性结局。希腊克涅《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作为忒拜国公民，必须服从国王的命令，不能为引外敌人入侵邦的哥哥收尸，但按照神

律，她又不能让亲人曝尸野外。安提戈涅最后遵从神律掩埋了哥哥，结果被国王处死。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中，赤卫队女战士马柳特卡和风雅英俊的白匪军官奥特罗克因为意外事故流落荒岛，在不知不觉中从你死我活的敌人变成了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然而一旦白匪的船只驶近小岛，马柳特卡却不得不向心爱的“蓝眼睛”举枪瞄准。

悲剧性推向极致，便会转换成荒诞。在悲剧类作品中，主人公的苦难和牺牲背后总还有一个价值设定，因而苦难和牺牲终归是有意义的，但荒诞表现的却是一种彻底的无意义感。二战后的荒诞派战争文学作品中，战争的意义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荒谬、虚妄和迷惘。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最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战争的荒诞性：首先，战争不再具有任何正当的目的，有的只是邪恶的私欲。善于投机的伙食管理员操纵辛迪加公司，一面同美国军队签合同轰炸德军的桥梁，一面又跟德军签合同，用高射炮攻击美国飞机，保卫桥梁。其次，身处战争中的人被荒诞的战争逻辑所操控，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确定性。军医丹尼卡为了冒领飞行津贴，挂名于麦克沃思的飞机上，麦克沃思自杀毁机，丹尼卡的名字也被从部队的花名册中勾去。虽然他仍生活在军

营中，但“证明他阵亡的材料却像虫卵一样迅速繁殖，而且无可争辩地相互证实”。再次，荒诞性还表现为荒诞的不可抗争性。投降手尤索林想以健康原因回国，但按照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疯子才可以停止飞行，同时又规定，任何想停飞的人都须自己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的人不可能是疯子。

战争文学不仅仅给人以幻灭感，也不仅仅止于对战争的谴责，它还给人以走出战争困境的希望和力量，从而呈现出战争文学特有的崇高感。崇高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主要体现在具有超凡气质的英雄身上。所谓“超凡气质”，不仅指勇武刚健和雄才大略，更是指为了理想和正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是指为了坚守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而以弱抗强、默默牺牲。“驾马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岳武穆是英雄，“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是英雄，《百合花》中不知名的小战士也是英雄；“阿开亚的武士之花”阿喀琉斯是英雄，《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没有任何惊人壮举的索科洛夫也是英雄。无论如何，正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所说，在战争绝境中，英雄人物“是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上的黑暗；他绝不仅仅是一盏点燃的灯，而是一颗沐浴着上帝的恩泽而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永不熄

灭的光芒使人茅塞顿开，令人刚毅坚强，使人英勇崇高”。

英雄有着超凡的力量，但英雄的力量毕竟是个体的力量，因而在崇高之上，战争文学的最高品格是史诗。所谓史诗，首先是指题材的重大和结构的宏伟，古今中外的史诗所表现的无不是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不是汪洋浩瀚的鸿篇巨制。但战争文学之史诗性，更是指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以总体性视域和现代理性精神对战争进行剖析、对历史进行追问、对人类命运进行思索。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冠有“史诗”之名的作品都符合上述定义。事实上，史诗有古今之别，古典史诗的视域往往囿于特定的民族、国家，以至于某个民族顶礼膜拜的英雄极有可能是涂炭异族的恶魔，而现代史诗的作者则理当从全人类的视域出发来反思战争。古典史诗有着非常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而现代史诗则不再寄希望于某一个神化的英雄。《战争与和平》中，没有一个传统史诗意义上的英雄，安德烈不是，彼埃尔不是，库图佐夫也不是。毋宁说，托尔斯泰以为，除非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行动起来，否则无以对抗战争之罪恶。古典史诗在情感特征上多是“独白的”、“单声部”的，而现代史诗则充满了理性的对话和争辩。《战争与和平》第三部长篇累牍的议论，曾经受到屠格涅夫、福楼拜等人的诟病，但在这些的确非常枯燥的议论背后，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关切；除非每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以高度的理性来反思、讨论“战争与和平”这一与地球上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问题，否则人类将永远走不出战争之阴影。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冷兵器时代古战场斯巴达克斯式的角力浓缩为岁月中的一个光影，甚至炮火、硝烟这些军事的典型符号在年轻人的心中也愈来愈陌生，只在影视与游戏中依稀可见。或许在和平安逸的空气中呼吸得太久，很多军事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也渐逝在拼博厮杀中注入了丰沛的时代元素和情感因素，对人物形象不再进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更添一份理性与生活气息。

然而英雄主义终究是军事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所谓军事，大多以战争为大背景，其间充满对抗性，亦难免有胜负、得失、荣辱乃至生死。创作者必有所褒贬和爱憎的倾向，故一切情节和形象便有了鲜明的导向性，直指人们的精神高地。

英雄还是凡人

或许英雄是伴随着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走进人们心灵深处的，之所以称其为英雄，盖因为他们突破了人类的某些极限，作出了超常人所为，留下了荡气回肠的壮举。儿时所熟知的英雄形象仿佛都与战火相连，或高擎炸药包，或手持爆破筒，或用胸膛堵枪眼，或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充分彰显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豪情壮志，不仅是男儿血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个人之于国家、民族的爱恋，结局多半是因为英雄人物的牺牲而扭转了战局，挽救了整个部队。而今的诸多军事题材文学影视作品中，英雄的形象又被赋予了一定意义上的性格特点，如《亮剑》中的李云龙、《狼毒花》里的常发、《杀虎口》中的白朗，包括《雪豹》中的周卫国、《平原烽火》中的罗金宝，他们武艺高强、智勇过人，却又特立独行、爱憎分明。他们有着血肉却并不完美，他们有着从幼稚鲁莽渐次走向成熟的人生成长轨迹。有鉴别力的人们也许偏爱他们的某一些特质，暗自汲取了他们人格魅力中蕴含的相似的因子，我想这才是作品所要宣扬的精神内核——爱国爱家的民族大义、英勇无畏的男子汉气概、敢做敢当的责任感、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除暴安良的悲悯情怀、重大问题面前的原则立场，不一而足，凡此种种足以让人跳出人物的影子而捕捉一种能让人热血沸腾的辐射源。

尊崇还是效仿

军事文学的创作者多半是有军旅经历的，抑或是对军事怀着热爱的发烧友，创作的源动力不尽相同，有对往事的缅怀凭吊，有对现实的记述描写，我想不仅仅是通过文字和画面让人们了解某一段历史或现实，更多的是想唤起受众内心深处埋藏的奋发向上的力量，激起思想和灵魂的共鸣，此实非易事。魏巍当年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无数的老百姓感动得潸然泪下，无需过多的渲染和夸张，人们仅凭切身的体验便能迅速融入作品之中，深深为之动容。显然，在价值观念多元的今时今日，不同的人对于英雄的定义已相差十万八千里，相比于商海的弄潮儿、谍报的精英、时尚界的明星大腕，军人的操枪弄炮、摸爬滚打似乎充满了士气，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很多着军事题材的影视剧报名人数参军的新兵很快发现现实中的军营并没有特种兵的刺激、陆战队的豪情；很多流血牺牲的场面让人感慨战争的残酷，避之惟恐不及；很多神勇过人的英雄事迹让历史爱好者们纷纷质疑其真实性；稍好一些的则表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无论从哪个层次受众的态度来看，军事文学都不得不在纯军事之外加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的内容，让英雄主义的标准不要高不可攀或是在现实中毫无付诸实践的平台。《石破天惊》《突出重围》中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新型指战员，可以在诸多的军演中找到影子，他们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高尚的道德标准，堪称当代的英雄，个体的文韬武略固然值得尊崇，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似乎更容易为大众所效仿。

瞬间还是永恒

即使没有了战争的大背景，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平民英雄似乎又拓展了英雄主义的内涵。一位柔弱的母亲，用手臂接住了从楼上跌落下来的孩子，母性的瞬间爆发让她具备了战士冲锋的姿态；一位普通的司机，在身体突遭重创、生命垂危之际，能强忍伤痛把车停靠在路边，确保乘客安全。一个又一个“最美”定格成无数令人动容的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似乎没有战火硝烟的衬托更显精神可贵。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的壮志豪情应当是万古长存的，在身体突遭重创的背景下体现得更为集中，却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化作涓涓细流渗透进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

我们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知道了“救国救民，侠之大者”，这种“侠”并不是堂吉珂德式的仗剑处处找人比武，为了公主与人决斗的骑士精神，而是英雄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时代变迁，“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行为或许还要受到法律的限制，然而我们所宣扬的英雄主义却能在关键的瞬间使正义得到伸张、艰难以克服、事业得以开创，这样的例子在军事文学中已不鲜见。《英雄时代》中描述的红色家旗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潮中如何再现祖辈们在战争年代的英雄情怀亦是一种巧妙的表现手法。英雄主义的精髓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深入挖掘的，也可以通过几代人的传承来彰显，与时俱进方得永恒。

英雄情怀的再次出发

□周志方

谁也没有料到，在和平崛起的今日中国，竟然是军事题材影视文学作品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繁荣时代。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军事题材作品，能够教会人们直面苦难、抗击命运，那么，和平年代的军事题材作品则富有更加深厚绵长的审美蕴藉：引领人们反观历史、反思人生，在艺术的洗礼中，为深藏心底的英雄情怀充电蓄能。透过英雄情怀借助军事题材影视这一现代表现形式的再次出发，我们感受到军事文学一个新的高潮期正在来临。

和平时代可以沉淀英雄情怀

什么是英雄情怀？英雄情怀是“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谋略，是舍身饲虎的大怜悯……战争是英雄情怀最好的炼狱。古往今来，人们提起英雄，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战争英雄。但是，除了文学性的纪实作品之外，成功塑造战争中英雄的电影作品却相对较少。中国早期的电影《风云儿女》、意大利二战期间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美国二战期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等不多的作品，或许可以算作战争时期的战争电影经典。但也有不少被人们广泛传颂、津津乐道的英雄题材作品，是和平时代创作者潜心沉淀的结果。毛泽东的十六字令写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种回眸一望、惊心动魄的心态，也许正好可以揭示文学创作者在和平年代对英雄既震撼又激动的心情。

和平时代之所以可以沉淀英雄情怀，一个客观原因是，战争是生死存亡的角斗，战争紧紧攫住被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使其始终处于紧张激烈地为生存而战之中，无暇思考；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只有当人们从战争中浴血而生、仓促回师时，我们才更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的伟大，这就是一种英雄情怀。我们离战争的距离越远，可以省思的背景和角度就越完善，对英雄情怀的理解也就越深入，这就是和平时代沉淀的英雄情怀更加丰富多彩的原因了。

和平时代可以雕砌英雄情怀

多年前，我得到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机会。在遵义、在石鼓镇、在太平渡、在松潘……当青山绿水间的一座座纪念碑在我的眼前巍然耸立的时候，我更加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五千里，视阻碍为泥丸的英雄气概。可以说，一座座纪念碑雕砌了红军的长征精神。

创作不是再现，而是提炼。英雄来自大地，但英雄的气概却如高天流云。在和平时代进行战争题材文学影视创作，必然是对英雄情怀雕砌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这个为英雄情怀建造的居所里看到了生龙活虎的石光荣、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李云龙、心沉如海的安在天……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人物，但他们真实可信，是基于真实的艺术升华。在和平时代里，这样的真实性、正能量尤为可贵。作为个人，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朝夕相处；作为英雄，他们又是家国在生死存亡一线间的定海神针。前不久，有人统计了重播率最高的“神剧”，其中，《亮剑》在5年内重播了千遍。这个惊人的数字，从客观上证明了和平时代英雄塑造的极大成功。

和平时代可以弘扬英雄情怀

战争并不拥有生产英雄的专利，和平时代的军队里同样英雄辈出。对于军事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而言，战争是英雄情怀的炼狱，而平时则是英雄情怀的熔炉。在炼狱里，英雄在绝望中诞生；在熔炉中，英雄在平凡里重生。和平时代是一面闪亮反光镜，既能照见幸福安宁，又能照见平庸乏味。无论是幸福安宁，还是平庸乏味，英雄情怀都像坚硬的脊梁，使人直立。和平时代是弘扬英雄情怀的大好时代。

许多新军军人的艺术形象激扬起了在和平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英雄情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仅有一个或几个许三是远远不够的。前段时间我随海军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在半年的时间里体验了水兵们在遥远的大洋上为了祖国利益和世界和平而战的艰苦卓绝，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战斗环境中，人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每次任务结束后，在漂泊于亚丁湾上的军舰甲板上组织的大洋影院都强烈地吸引着年轻的战士。遗憾的是，他们最钟爱的军事题材影片里，中国拍摄的只有《冲出亚马逊》等寥寥几部。

身为一名军队专业编剧，我感受到了压力。我们不能让好莱坞式的英雄成为他们的精神标杆。英雄并非没有国界，英雄首先是民族的、国家的。和平时代弘扬英雄情怀，首要的也应该是弘扬民族品格的英雄情怀。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军旅影视文学领域，这样的创造是我们军队专业编剧的责任，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李茂增



张 慧



周志方



李庆文



马学军

创作切忌守成规

□李庆文

越来越丰厚的编剧酬劳也吸引专业作家进入影视业，从而造成军旅作家一定程度的流失。受收视率的影响，军事影视与军事文学的雷同化日趋严重，造成严重审美疲劳。透露出文艺作品的挤压，导致军旅文学创作的冲锋之路逼仄且长满荆棘。时至今日，我们有许多战争电影堪称经典，如《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野战排》《风语者》等等。回眸中国军事电影，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变得很冷门，惟有冯小刚导演将短篇小说《官司》拍成了电影《集结号》，将中国战争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好的电影要依靠好的文学做基础，为什么冯小刚能频频拍出好作品，因为他背后有王朔、刘震云、刘恒等一帮作家在撑着。

老实说，关于战争题材的创作我们依然有巨大的发挥空间。自1840年英国女王派来了装着鸦片的大船，中国就在战争中屈辱和抗争了100多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东三省；再至卢沟桥事变；我们常说8年抗战，指的是全面抗日的时时间，如东北抗联算抗日时间就长达13年。中国以牺牲3000多万军民的代价惨胜，山河呜咽，残阳如血，何其壮烈！可除了一批批轻轻松松干掉鬼子的电视剧，哪有几部小说因完整诠释这场战争而青史留名？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其中又深埋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有一

些战争已经出了一些代表作，如《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

最后不安地问，中国军旅作家何以墨守成规、画地为牢，对军事文学自我设置太多的“雷区”，不敢大胆地尝试和创新。吃螃蟹者少之又少，比如莫言曾有一部很少被提及的军事题材小说《战友重逢》，写“我”在探亲途中遇见已经阵亡的老战友，邀他上树回忆由生到死的一连串奇异的经历，此写法显然是前些年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试水之作，可能是因为“与鬼交谈”的方式难以被主流接受，至少有人提及。先不谈他的这部作品成功与否，这种敢于尝试新路子精神就值得学习。不怕文中有“鬼”，只怕心中有“鬼”，牵绊了手脚。

如果可以，我想这样说：军旅文学的出路在于作家要自我解放，要“尽情去描述战争的、泛战争的，一切与战争与军事相关的，以人类的目光去审视军人、军事、战争和承载这一切的整个世界的事物与情感，运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黑色幽默等所有适合的手法 and 主义，大胆犀利、一针见血地赞美、批评，描述令人着迷的、神圣威严的、泛着人性光辉的事物”。总之，军人严格服从军规乃天职，但作家应打败你自己这个捆绑你思想的敌人，去占领文学的高地，插上自己的旗帜。

升腾一股英雄气

□马学军

当代作家不可能像老一代作家那样积累鲜活的战争体验，商业文化的强烈冲击，又使作家少有鲜明的历史记忆和终极关怀。但是对军人的最大奖赏。我们不要战争，但事实上严峻的安全环境并不允许我们高枕无忧。一支伟大军队的荣耀，不仅体现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举，也体现在它的英雄们所奠定的精神标高。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烈士是英雄，在抢险救灾中牺牲的勇士也是英雄，在训练场上准备打仗的同样是真心英雄——历史从不排斥造就自己时代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不问出处，遍地都有英雄。作家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吐故纳新，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

至今仍记得我参加毕业学员岗前集训时的老营长。那时的我们正是激情满怀又自视甚高的年龄，但此君却毫不留情地打击了我们。他让我们烈日下站军姿、雨中练长跑也就罢了，还让我们去喂猪，打扫猪圈。我们

暗暗和他较劲，没一个人动。他便把全体学员集合到哼哼叫叫的猪圈前一顿臭骂：连拔草这样的小事都干不好，连喂猪这样的小事都不愿干，你们能干什么？发射导弹，还轮不到你。当时我们一边抬泔水，一边心想，你能干什么？参军多年才混了个只掌管十几个兵的小营长。几年后，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转业当上县国土局副局长的他为抢救落水学生牺牲了。想到当年对他的误解，很是愧疚。批评人不讲方式，这样的人算不算英雄？我想，他是的。捷克作家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虽然营长普普通通，没有惯常的神化色彩，没有激昂的豪言壮语，但在危急关头，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纵身一跃的。我第一次发现英雄离自己这么近。十多年了，老部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可我记着他，相信还有很多人在记着他。古罗马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冷兵器时代古战场斯巴达克斯式的角力浓缩为岁月中的一个光影，甚至炮火、硝烟这些军事的典型符号在年轻人的心中也愈来愈陌生，只在影视与游戏中依稀可见。或许在和平安逸的空气中呼吸得太久，很多军事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也渐逝在拼博厮杀中注入了丰沛的时代元素和情感因素，对人物形象不再进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更添一份理性与生活气息。

然而英雄主义终究是军事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所谓军事，大多以战争为大背景，其间充满对抗性，亦难免有胜负、得失、荣辱乃至生死。创作者必有所褒贬和爱憎的倾向，故一切情节和形象便有了鲜明的导向性，直指人们的精神高地。

对和平年代英雄主义的思考

□张 慧

面向未来，我们有必要呼唤有远见有担当的军旅作家，走出书斋，走进军营，走入兵心，再次吹响英雄主义的集结号，让英雄气在天地间升腾。